

校园科层下大学生交往模式的跨族群比较^{*}

王 庚

摘要: 基于对天津市几所高校汉族大学生和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交往层圈差序性的调查,研究了校园科层制度下交往模式的族群差异问题。结果发现,汉族大学生的交往模式呈现出明显的科层层圈的差序特征;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交往模式的族群边界特征更为突出,科层层圈的差序特征不明显。在校园科层制度的背景下,不同族群大学生的交往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 校园科层 交往模式 层圈差序性 跨族群比较

交往是指“相互来往”,它意味着完整互动过程的出现,表明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关系的达成和延续。在某种程度上,交往模式也是人际关系模式。但从字面意义看,二者仍存在差异。人际关系泛指人与人的关系,而交往则更为突出交往行动发出者的主体存在。^①

当今不同族群的交往机会日益增多,交往模式研究也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本研究将视野聚焦于大学校园中的科层制度,对汉族大学生和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交往模式进行跨族群比较。^②我们感兴趣的是,特定群体在交往中是否表现出大体稳定、相互近似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在校园科层制度的背景下,不同族群大学生的交往模式是否相同或不同?

一、研究背景

人类学对交往模式的研究早于社会学。自摩尔根以来,一些人类学者提出要以“亲属圈”“多重同心圆”等类似模式来说明他们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的原住民的基本社会关系特征(张江华,2010;阎明,2016)。在社会学奠基期的重要人物中,滕尼斯、涂尔干(于海,1993)对公社与社会、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进行了划分,其中就包含了从宏观角度认识人们交往模式及其变迁的思想成分。齐美尔(于海,1993)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对三人团体进行了研究,此后微观交往模式开始进入社会学的视野当中。“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学的重要流派之一“符号互动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交往模式的生成过程。帕森斯(特纳,2004)有关社会系统的构建提出,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意义就在于,基于个体角色所扮演的行动者之间的模式化关系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产生。基于“行为主义”所提出的奖惩机制,霍曼斯(特纳,2004)探讨了行动者为什么要将社会交往与互动模式延续下去的原因。

韦伯(Weber,1979)所提出的科层制理想型奠定了现代组织制度下交往模式研究的基础。基于对近代资本主义组织结构的观察,韦伯提出了按照理性原则设计的纵向分层、横向分科的科层制理想型。在这种理想型中,一切私人的、非理性行为都会因为同现代制度格格不入而遭到排斥。但是问题在于,被科层制理想型所屏蔽掉的私人交往并不会因此而从制度中彻底消失,相反它反而有可能对科层制构成反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起来,这进一步推动了交往模式研究进入新

^{*} 本文为天津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天津高校维吾尔族大学生社会网络研究”(TJSR16-00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孙晓冬博士的批评指正,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一般来说,交往行为至少是双向的,存在着双主体。但本研究有所不同。本研究利用个体中心社会网收集资料,因而是从单一主体(即关系一方)出发对交往关系与行为进行研究。

^② 本文对族群和民族这两个概念不作进一步区分。

阶段。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 1985)注重把微观层面的互动行为研究同宏观层面的理论模式研究结合起来。他本人对弱关系的强调极具启发,“弱关系-强关系”成为人们思考交往模式及其功能的重要出发点。随着研究手段的进步,“精确测量那些处在发展和检验阶段的概念成为可能”(林南, 2009)。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交往模式经验研究的发展。

布劳(1991)研究了族群交往模式,其研究发现改变了之前交往模式集中于个体层面的状况。族群交往模式受到群体规模的影响,规模较小的群体发生群际交往的概率要明显高于规模较大的群体。由此开始,布劳展开了一系列推论,从而形成对群体交往模式的完整论述。布劳之后,有追随者(Blum, 1984, 1985)研究了族群内部社会属性分布的异质性特征对增进群体交往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就目标群体同周遭群体的关系因为后者的异质性特征而呈现出不同状况,也有追随者(Sampson, 1984)对此展开了研究。林南(2005)把社会行动区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这就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了交往模式得以建立的深层原因。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时代快速推进,国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和移民的社会交往模式也开始给予更多关注。

从上述有关国外交往模式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种趋势。在研究层面上,开始从思想走向经验、从个体走向群体(族群)、从一般交往模式研究走向特定制度背景下的交往模式研究;在研究手段上,出现了以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为代表的更为精细的定量方法。

基于对中国社会关系特性的关注,对本土背景下的交往模式研究业已取得很多进展。

首先是有关交往模式的一般理论思考。在西学东渐和本土资源共同作用下所产生出来的差序格局理论就包含了对中国人交往模式的理论思考(阎明, 2016)。这方面研究一直受到后世重视。无论是对中国人社会关系类型的亲疏划分(黄光国, 2004),还是对交往层圈内外有别式的理解(杨宜音, 1999),这些都受到差序格局理论的影响。

对交往模式的一般理论思考还有另一条路径,那就是基于“人伦”“人情”“报”等本土概念工具,对中国人的交往模式及其内在机理进行探索。梁漱溟(2005)强调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为解释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找到了根本性的文化基因。杨联陞(1987)很早就把“报”作为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基础。围绕“脸”与“面子”“人情”等概念,金耀基(1988)、翟学伟(2016a)等也探析了中国人人际微观互动的机制。

其次是有关交往模式的经验研究。边燕杰(2004a, 2004b, 2006)逐渐形成了运用拜年网、餐饮网等进行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研究的系列成果。边燕杰和张文宏(2001)关注职业流动过程中来自亲属和朋友的支持模式。张文宏等(1999)对天津城乡社会网的调查发现,人们的社会交往具有高趋同性、同质性和紧密性等特征。

再次是有关特定制度与制度变迁背景下的交往模式研究。阮丹青(1990)进行了社会讨论网的中美对比以及大陆和台湾对比,发现同事在中国大陆的讨论网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其实就是对单位制下人际交往模式的反映。杨美惠(2009)、阎云翔(2000)所进行的关系研究展现了文化因素在当代中国城乡社会制度中的深刻存在。

最后是有关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交往研究。杨磊、孟楠(2012)和严义娟(2008)对在内地务工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内地学习的维吾尔族高中生的社会适应问题分别予以了关注。马冬梅(2006)考察了都市生活中外来回族群体社会网络的功能。不过,总的来看国内学术界对少数民族社会交往的研究尚未进展到交往模式的层面上。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尝试对校园科层制度下汉族和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交往模式进行跨族群比较。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层圈差序性”这一核心概念,探讨校园科层制度下不同族群大学生在交往模式上的差异。

(一) 层圈差序性的产生、测量及递减

首先讨论层圈差序性的产生。在对差序格局理论的澄清中,层圈差序性的概念呼之欲出。对差序格局理论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差序格局到底是“人与人之间横向的亲疏差别”(某种程度上的人际关系模式),还是包括了“纵向的等级差别”(社会等级结构)(阎云翔 2006; 阎明 2016)?

基于社会网研究的视角,廉如鉴(2010)指出,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差序格局到底是“一个人的关系格局”还是许多“个人关系格局”而形成的“网络结构”?这种划分实际上正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个体中心网络”与“整体社会网络”之间的区分。因为“个体中心网络”注重分析个体同各种人员交往关系的强弱,而“整体社会网络”则关注社会群体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结构特征。在廉如鉴看来,虽然费孝通(1985)希望将差序格局作为中国社会结构来看待,然而其文本中对差序格局的阐释主要是将其视作以“己身”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这相当于个体中心社会网(而非许多个体构成的整体社会网)。但差序格局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体中心网。“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明显的圈层性,只有亲疏远近,这就只是一般性的自我中心网络,而不是差序格局。”由此可见,“层圈差序性”是理解差序格局理论的重要支点之一。研究这种社会关系网可以回到问题的原点,即同心圆形态的、具有“层圈差序性”特征的个体中心社会网。

本研究无意也无力介入有关差序格局的“纵横之争”,但强调差序格局理论至少包含了对中国人社会关系理解的部分内容(即便强调差序格局作为纵向等级结构的学者也不可否认这一点)。而差序格局理论所包含的“层圈差序性”内涵,即由“己身”外推各种关系强度逐层递减的特征,如果用来作为对中国人社会交往模式的概括性理解,则有可能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认同。

其次讨论层圈差序性的测量。校园科层制度下的交往层圈具有“去血缘”特性,它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以血缘亲属关系作为己身之外的核心层圈,逐渐向“非亲属关系”过渡,关系强度逐层递减,这是“传统”差序格局研究的基本立足点。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层圈性已变得越来越模糊(阎明 2016)。在军队、大学校园这些科层组织中,血缘关系基本被排除在外。因而,接下来我们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在科层制度下是否仍存在着类似于同心圆的层圈?

在军队、医院这些科层组织中,看起来方方正正、条块分割的科层空间和层圈关系似乎有些遥远。不过,基于个体中心网的研究视角,科层组织中的结构空间完全有可能是层圈性质的。比如,一名教师可以以自己为中心,层层外推发展出系部-学院-学校直至校园之外的不同层圈关系,从而形成类似于多重同心圆的社会关系格局。同样,一位大学生也会以“己”为中心,向己身之外的宿舍-班级-学院-学校以及校外空间拓展自己的社会交往,从而形成类似于同心圆的社会层圈。

科层制度环境下交往模式的层圈性分析,要改变以往交往模式研究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状况。我们认为,现代科层制度下层圈差序性的测量应该重点关注关系的后天建构,即自致性关系的建构和发展问题。对这种关系的把握不仅存在着强度问题,还有同己身存在联系的关系结点的数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在血缘关系网络中,与己身有关系的数量不是本人所能决定的。而在基本属于后天建构的关系网中,每个人在不同层圈发展关系的情况各有不同。因而,在不同层圈上分布的关系数量差异是否具有层级递减特征,也就成为我们考察科层制度环境下交往模式的关键指标。

最后讨论层圈同质性的递减。社会网研究中有关交往对象在性别、教育程度、职业背景等方面的同质性分析由来已久。人们彼此间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社会交往行为的达成,其原因不一定源自于关系的强弱,而是源自于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邱泽奇、乔天宇 2017)。本研究就是试图考察校园科层下所形成的交往层圈的同质性,以及同质性是否具有逐层递减的规律。

在校园科层环境下,大学生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主要都是后天发展起来的。如果把这些关系划分出层圈的话,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些关系首先集中在宿舍层面上,然后向班级层扩展,进而是学院层和学校层。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存在着“天然”差异和界限(翟学伟, 2016b)。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之间的距离要大于同学之间的距离。由此,大学生会形成以“己”为

中心,向外逐层递推至宿舍、班级、学院、学校、本校教师这几个层圈上。“己”与这些层圈的关系渐远渐疏。这就意味着,越是向外发展,发展出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就越低,从而出现同质性增量递减的情况。

(二) 大学校园内不同族群的社会讨论网

首先运用提名法,对大学生进行个体中心的讨论网调查。不同于一般提名法调查,本次调查避开了家庭成员和亲属等血缘关系,而是依据大学生活的科层特征来界定提名中所涉及到的几类人。分别询问过去半年中同大学生讨论过重要问题的几种人,包括室友、本班同学、本院同学、本校同学、本校老师以及其他。

在统计每一个人的讨论网中几种人所占比例的基础上,分别计算出前五种人的总平均值,包括P1(讨论网中同宿舍的比例,即室友同质性)、P2(讨论网中同班的比例,即班级同学同质性)、P3(讨论网中同学院的比例,即学院同学同质性)、P4(讨论网中同学校的比例,即学校同学同质性)、P5(讨论网中同学校教师的比例,即学校师生同质性)

其次找出相邻两层的比例增量 $P_i = (P_{i+1} - P_i)$ ($i=1, 2, 3, 4, 5$, 分别代表宿舍同学层圈、班级同学层圈、学院同学层圈、学校同学层圈、学校教师层圈)。这些就是本项研究的因变量。

本研究没有直接把讨论网的人数作为因变量,而是分别询问同自己讨论过重要问题的每一个人属于上述几种类型中的哪一类。然后根据社会网的同质性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出室友同质性、班级同学同质性、学院同学同质性、学校同学同质性和学校师生同质性,以期达到更为准确的测量效果。

(三) 研究假设

科层制度环境下的交往模式研究,就是要关注和“己身”关系密切的人在各个层圈分布的同质性增量情况,关注层圈同质性增量是否逐渐缩小。对生活于大学校园的各民族大学生来说,这一问题的具体体现就是,他们社会交往的各个层圈之间的同质性增量是否存在递减。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研究假设1:汉族大学生的交往模式在形态上表现为以宿舍为基准层外推,相邻两层同质性增量递减。

由于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原因,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大学生在校园活动和社会交往中都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民族特征,形成族内社交层圈。在同汉族等其他民族大学生的相互交往过程中,他们也发展出族际社交层圈。对来自特定民族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在校园科层制度环境下所发展出来的交往模式是否同汉族大学生一样?这就需要对校园科层制度下的交往模式进行跨族群比较。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人数从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而各高校本科生的招生规模多在两万人以上。作为相对较小、具有较强民族文化特征的族群,其群体内部较为团结,彼此联系较多。同时,为了更好开展学生工作,很多高校会配备若干名来自新疆地区的教师。这些教师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联系较多,关系紧密。这些因素导致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校园社会网不同于汉族大学生,社会交往的族群边界更为明显。

族群边界往往超越校园科层制度的实体边界(如宿舍、班级、学院)而相对固定在学校层面上。维吾尔族大学生分散在不同院系,但他们往往在定期举行的校园集体活动(如迎接新生、庆祝民族节日)中和清真餐厅中彼此熟识,建立起紧密关系,从而形成以校园为单位的民族群体。学校层面提供了民族大学生交往的适宜空间,维持了适度的群体规模,足以满足情感交流、信息沟通等各种需要。

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整个学校层面建立起族群关联。在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学校教师的多层级科层体系中,维吾尔族大学生主要在学校层面同本民族同学和来自新疆的教师开展社交行为。这是在校科层环境下形成的特殊制度-文化现象。他们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交圈边界同校园层圈基本重合。这一点体现在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学校教师交往的同质性增量上,就是以

宿舍为基准层向外的同质性增量在学院到学校层发生逆转,由增量递减转为增量激增。

根据以上说明,我们可以提出研究假设2:在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交往模式中,层圈同质性增量递减的情况在从学院层到学校层被打破。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引入“民族”这个自变量,用以考察层圈关系的差序性在特定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群体中是否成立?具体而言,就是将“民族”作为分析层圈差异性的核心自变量,在对层圈差异性的多元解释中,分析民族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研究假设3:从学院层到学校层(包括学校同学层和学校教师层)的同质性增量激增(同汉族大学生相比而言)的情况,主要是由民族因素所导致。

(四) 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择天津理工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进行调查。初步设想是对这两所高校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普查。但在具体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由于采用集中填答问卷的方式,一些同学没能参加。在接受调查的179名维吾尔族大学生中,天津理工大学63人,天津师范大学116人,占两校维吾尔族大学生总数的87.3%。此外,对哈萨克族和其他民族大学生^①也进行了调查,得到问卷75份。

资料收集的第二步针对汉族同学展开。由于对维吾尔族大学生不是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选取汉族大学生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依照配额抽样的原则,选取规模大体相当、女性比例较高的社会工作专业大一至大四(每个年级各两个自然班)的汉族学生(共228人,其中完成调查213人)进行调查。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抽样设计是在研究条件限制和社会统计学研究的最低要求相互制约下所采取的折中方案。

三、研究结果

在本研究中,宿舍成员比例即指宿舍同质性,本班级同学(含室友)比例即指班级同质性,本院同学(含本班级同学)比例即指学院同质性,本校同学(含本院同学)比例即指学校同质性,等等(见表1)。

表1 汉族和维吾尔族大学生相邻层圈的同质性增量比较

I	汉族大学生 (211人)		维吾尔族大学生 (171人)		汉族和维吾尔族大学生比较 (t检验) $P_{(P_i\text{汉} - P_i\text{维吾尔}=0)}$
	P_i	P_{i+1}	P_i	P_{i+1}	
1	.229	.129	.21	.126	.860
2	.358	.100	.336	.075	.136
3	.458	.080	.411	.183	.000
4	.538	.023	.594	.069	.000
5	.561		.662		

从表1可以看出,对汉族大学生而言,他们在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学校教师这几个层圈上的增量呈现逐层递减的情况:0.129 > 0.100 > 0.080 > 0.023(即 $P_1 > P_2 > P_3 > P_4$)。因而,研究假设1的检验目标 $P_i > P_{i+1}$ 获得初步证实。

然而,对维吾尔族大学生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在由学院到学校层的同质性增量在各个

^① 由于哈萨克族大学生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同维吾尔族大学生更加接近,且数量较多(69人),故作为参照纳入到研究中来。由于对汉族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普查,涉及到其他民族(回族、土家族等)6人,因数量较少仅作为参照保留。

增量中最大,从而显示出同汉族大学生不一样的社交层圈特征。

根据 t 检验结果,我们对汉族和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校园情境下逐层增量均值相等($P_{汉} = P_{维吾尔}$)的假定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从宿舍到班级层上,汉维大学生讨论网同质性的增量差异几乎不存在。这个结论在从班级到学院层也基本成立。然而,在接下来的从学院到学校层上差异十分明显(二者无差异的概率比万分之一还要小,为小概率)。而在从学校同学层扩展到学校教师层上,这两个民族大学生之间的同质性增量差异也十分显著。

同质性及其增量变化的结果表明,长时间的相处经历(同一宿舍、同一班级乃至同一学院)会超越各种先天后天的差异(包括民族差异)而增加彼此熟识的程度。然而,这依然没有改变维吾尔族学生在民族边界内社会交往频密的事实。维汉两族大学生最大的增量差异恰恰发生在由学院到学校外推的层面上。这恰好证明了我们此前对维吾尔族大学生社会交往情况的基本认识。

不过 t 检验结果只能证明汉维两族大学生之间存在差异,并不能说明到底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下面我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讨论产生这种差异的具体原因。

表 2 讨论网学院 - 学校教师层同质性增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系数	T 或 F 值	标准化系数
民族			
维吾尔族	.235	4.35***	.279
哈萨克族	.316	3.01***	.163
其他民族	.306	1.02	.043
性别	.054	2.48**	-.122
来自城/乡	-.035	-.95	-.059
是否党员	-.064	.33	.013
是否班干部	-.081	.69	.017
是否加入学校社团	-.066	-2.1**	-.073
是否在内地读高中	-.053	-.93	-.05
是否在天津打过工	.039	-.28	-.004
是否在天津当过志愿者	.034	.79	.018
是否有男/女朋友	.027	-1.38	-.069
年级			
大二	.051	.33	.041
大三	.023	1.3*	.07
大四	-.071	1.38*	.08
感觉生活快乐程度	-.020	-.93	-.027
讨论网人数	-.090	-4.97***	-.037
_cons	-.624	2.57	
R ²	.161		
调整后 R ²	.107		
样本量	181		
自由度	17		
F		3.01***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首先令 $Y = P_3 + P_4$ 。把“学院到学校同学同质性增量”同“学院同学到学校教师同质性增量”合在一起(即从学院到学校教师层圈的同质性增量),作为新的因变量。这是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大学生在这两个增量上都表现出明显差异。

我们把“民族”作为核心自变量。具体取值为 $1 = \text{汉族}$ $\beta = \text{维吾尔族}$ $A = \text{哈萨克族}$ 。以汉族为参照群体,对“民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由于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在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在研究中也给予了关注。

控制变量分别为性别、家庭居住地、是否党员、是否为班干部、是否参加学院学校的各种社团等。

由于因变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正偏态,故首先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以汉族作为参照的情况下,“是否为维吾尔族大学生”对因变量(从学院到学校教师层的讨论网同质性增量)的影响十分明显,“是否为哈萨克族大学生”对Y的影响也较显著。当这两个变量以肯定作答时,相应地会增大因变量的数值。如果是其他少数民族(回族和土家族等),则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控制变量“讨论网的人数”“性别”“是否参加各类学校社团”的影响较为显著。这意味着,讨论网的人数越多、性别为男性、参加了各类社团的人,会相应减低因变量的数值。这是因为,出现以上情形时会显著扩大同学的社会交往面(本学院扩展到整个学校,乃至更大)。然而,这种情况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中会发生逆转。在以汉族作为参照的情况下,他们在学院到学校层同质性增量的强度会不降反升。而标准化回归系数则显示,民族这个核心自变量较之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影响程度)更大。总体而言,以上模型对因变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调整后 $R^2 = 0.107$)。

至此,我们可以对本研究所提出的三种假设分别予以检验。首先,对汉族大学生的调查表明,的确存在着以宿舍为基准层外推相邻各层的增量递减的情况。其次,对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调查表明,上述逐层外推的增量递减的情况不仅无法得到证实,甚至出现了相反结果。对维吾尔族大学生来说,在从学院到学校层的同质性增量激增(出现各层圈增量的最大值)。最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来自核心自变量“民族”的影响十分显著。较之汉族,如果被调查者是少数民族中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则从学院到学校教师层的同质性增量会显著增加。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社会网分析的角度出发,尝试对特定科层制度(校园科层)下的交往模式进行跨族群比较。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两所地方高校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大学生当中,他们在交往模式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汉族大学生的交往模式主要是以校园科层制度为基础,表现出随宿舍-班级-学院-学校的层圈差序性而逐层递减的科层差序性;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交往模式的科层差序性特征并不明显,而基于群体边界而形成的族群边界特征特别显著。

汉族大学生交往模式的科层层圈特征明显。这表明,生活在科层制度下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该制度的影响。维吾尔族大学生以族群边界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交层圈更为显著。这意味着,还有比科层制影响更为显著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很可能就是运用社会网分析还暂时无法处理的“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因而,本研究目前所作的分析还只是形态学意义上的制度-结构分析。如何能够从“形态”研究进一步转换到“心态”研究,对特定族群的价值、情感与伦理内涵等“文化因素”进行研究,以及如何通过社会网分析手段实现对文化因素的研究,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此外,本研究在设计阶段控制了族群规模。但不应否认的是,族群规模对交往模式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引发的进一步思考是,类似交往模式上的差异是否在文化背景不同且规模差异较大的群体(如海外留学生与所在国大学生)中存在?这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的调查样本并非随机抽样,这会导致研究结论无法进行推论。有关现代科层制度下交往模式的深入研究,仍需日后研究的深入展开。

参考文献:

- 布劳·彼得,1991,《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边燕杰,2004a,《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04b,《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开放时代》第2期。
- 2006,《网络脱生: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 边燕杰、张文宏,2001,《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 黄光国,2004,《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黄光国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金耀基,1988,《“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 廉如鉴,2010,《“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开放时代》第7期。
- 梁漱溟,2005,《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林南,2005,《社会资本》,载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9,《社会网分析讲义·序言》,载罗家德著《社会网分析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马冬梅,2006,《都市外来回族穆斯林社会网络的建构——以桂林市为例》,《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
- 邱泽奇、乔天宇,2017,《强弱关系与关系人特征同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第1期。
- 阮丹青,1990,《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兼与美国社会网比较》,《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特纳,乔纳森,2004,《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阎明,2016,《差序格局探源》,《社会学研究》第5期。
- 严义娟,2008,《在内地学习的维吾尔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社会适应》,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阎云翔,2000,《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6,《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杨磊、孟楠,2012,《赴内地务工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浅析》,《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
- 杨联陞,1987,《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杨美惠,2009,《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杨宜音,1999,《“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于海,1993,《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翟学伟,2016a,《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6b,《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社会》第5期。
- 张江华,2010,《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社会》第5期。
-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第2期。
- Blum, Terry C. 1984, “Racial Inequality and Salience: An Examination of Blau’s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Forces* 62(3).
- 1985,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 Test of Blau’s Macrosociologic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Social Networks* 78(6).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 Sampson, Robert J. 1984, “Group Size, Heterogeneity,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A Test of Blau’s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Social Forces* 62(3).
- Weber, M. 1979,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王兵

But at present ,the behavior modification towards juvenile delinquent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 of “strong protectivity and weak punitivity” ,so it should move to the direction of punitivity adequately. Starting from this idea ,we could find three approaches to realize the punitivity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towards juvenile delinquent in our country ,namely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measures towards juvenile delinquent ,constructing the conversion mechanism among different modification measures , and implementing the judicialization of judgment in behavior modification towards juvenile delinquent.

Keywords: Juvenile Delinquent Behavior Modification Punitivity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he Cross-ethnic Comparis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under University Bureaucracy Wang Geng(66)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orderly-diversity in communication circl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everal universities in Tujian City ,including Han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and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ssuming Uygur nationality as the main body. Based on the survey ,this paper conducts the initial study on the issue of ethnic difference in communication patterns under university bureaucrac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or the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mong Han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orderly-diversity in circles is obvious; for the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mong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ethnical boundary is more obvious ,while the characteristic of orderly-diversity in circles is not obvious. In the context of university bureaucracy ,the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University Bureaucrac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Orderly-diversity in Circles Cross-ethnic Comparison

Th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lass Environment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Liu Hao(74)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ignore the various differences among classes in school. This paper adopts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to analyze the data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main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class environment in middle school on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class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influence of class environment in school on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is significant; several important factors could influence class environment ,including school resources ,the sources of class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class advisers’ gend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eaching age. In order to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the reform in educational polic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developed by class environment and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class environment.

Keywords: Class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Class Adviser Educational Inequality

The Comparison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Behavior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Low Self-esteem and Individuals with High Self-esteem Wang Shuizhen & Ma Hongyu(86)

Abstract: Using “The Self-esteem Scale” , “The Internet Social Capital Scale” and “Questionnaire on Social Network Using Behavior ” as instruments ,this study conducts the investigation of 409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comparing the using behaviors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low self-esteem and individuals with high self-esteem and the accompanied effects ,we try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ocial compensation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or the individuals with low self-esteem ,their scores in using intensity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scores of the individuals with high self-esteem; the self-esteem h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prediction effect on internet social capital; through the using intensity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and the link-style mediating rol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self-esteem could also influence the individuals’ internet social capital. This conclusion has the inconsistency with some views of social compensation theory. But the conclusion could further verify that internet behavior is the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real behavior. The individuals with low self-esteem would adopt the presentation pattern of self-protection in real life ,they adopt the same pattern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Keywords: Self-esteem Internet Social Capital Social Compensation Theory